

香港中學語文單元教學發展的路向

周漢光

香港中文大學課程與教學學系

香港中文教學的發展，近年來有了很大的進步。在課程組織方面，注重單元教學，有取代以往實行多年的單篇課文教學的趨勢，使語文課程的結構更趨嚴謹，對落實語文教學目標更為有利。

另一方面，自從預科中國語文及文化科實施以來，香港中小學的語文教學，開始重視中國文化的探討，使本港學生有更多機會從語文學習的角度去認識及反思中國文化，這是一個非常正確的發展方向。

公元2002年，本港中學中國語文科的課程將會有所改革，屆時一個嶄新的中學中國語文課程行將面世。由於它直接影響本港萬千個中學生學習中文的成效，因此課程設計必須謹慎。教育署近年來在本港多間中學實行這個課程的試驗計劃，用心良苦，可見一斑。

本文試從語文教學目標、校本精神、內容精簡與不同單元組合的形式等因素，探討香港中學中國語文課程的組織方向，以便更有利於語文教學目標的落實。

香港現行中文科教材組織的模式 及其不足之處

中文教材的組織方法，常見的有兩種：一種是以一篇篇的範文的單位，另一種是以單元作為單位。本港中學語文科的教材，長期以來都採用「文選型」的編排。中學中文教科書已發展出一套模式，一般包括「學習重點」、「作者」、「解題」、「預習」、「注釋」、「問題討論」、「應用練習」、「教學活動」等項目。這種模式，是希冀學生通過一篇篇課文的

學習，去全面掌握語文知識。這種組織與編排方式，直接影響了教師的教法，以及學生的學法(周漢光，1998)。

若細心審視，這種「文選型」的編排取向，實有下列不足之處：

1. 以範文作為主體，而非以語文基礎知識或語文技能作為主體，違反了張志公等語文教育家所主張的「課文只是例子，語文基礎知識與技能才是目的」的原則；
2. 課文與課文之間的聯繫較少，學生所學到的也只限於一篇篇課文所帶來的語文知識及語文技能。學生在認識上缺乏系統，知識的技能也不容易掌握牢固。
3. 只用一篇課文，帶出的語文知識與能力，只能稱為一些孤立的例子，內容比較單薄，可引發學生思考的程度也相對地較低；
4. 效率不高，質量也難得到保證；
5. 結構欠完整、系統性不嚴謹，序列性也不明確，因此學習的階梯性不強，影響學生學到的東西欠缺整全性，對認知造成缺憾。(周漢光，1998；周正逵，1988)。

由於「文選型」編排方式有上述的不足，因此形成：

1. 語文能力訓練的項目，仍居於附屬的地位，違反現今語文教育著重培養能力的原則；
2. 教育容易墮入只注重內容而忽略語文訓練的圈套；
3. 學生的學習，不是運用語文的基本知識去理解課文，因此使學習事倍功半；
4. 不易達到教材編排由淺入深、由易到難、循序漸進的原則，因而影響學習效果。

語文單元組織的特點及其可取之處

由於「文選型」教材的編排方式，存在上述的缺點，而大陸自八十年代，已開始實施單元教學。最初是以文體作主導，把幾篇文體相同的課文組成單元，進行教學(歐陽汝穎，1998)。

所謂「單元」，是指學習的單位或段落。同一科目的教材，分為大小不同的教學單位。這些單位是性質相同或有內在聯繫的教材，組成一個整體，分編節目，安排作業，從傳授知識到鞏固應用，連續在一段時間內進行。單元與單元之間有一定的聯繫（陳元暉，1988）。

黃政傑（1992）指出：教學單元是指教學的完整單位，提供學生有關某一主題的完整學習。

錢樹信（1989，引自周南山，1989）指出：單元教學是從課文特點和學生實際需要出發，把閱讀訓練、作文訓練、語文知識幾個方面結合起來，進行總體設計。通過一兩篇課文的導讀，帶動其他課文的自讀，起舉一反三的作用。

程榮華（1989，引自周南山，1989）指出：

1. 單元教學是一種系統化、科學化的教學體系，它既不同於單篇教學，也不是將幾篇課文簡單地組合在一起，而是根據學生認知結構發展的特點，培養學生的基本能力，以發展學生的創造性思維為目標。
2. 組成單元的文章，在知識結構上要有內在的聯繫。這種聯繫可以是多種形式的，是文體的，是題材的，是寫作方法上的。
3. 這些課文，組成一個知識整體。教師根據學生的學習心理，安排各種課文的類型，使學生在接受學習的基礎上，學會如何學習及發揮積極學習的主動性。

而事實上，單元教學法，一般包括下列四個環節：

1. 自學探究
2. 重點講授
3. 綜合訓練及
4. 總結鞏固

這種安排，能按照知識的系統、結構，兼顧學生的實際水平，使教與學都更有效率。仔細分析，利用單元教學，實在有下列的好處：

1. 使學生獲得更豐富、更有系統的內容；
2. 使學生有更多訓練歸納、分析能力的機會；
3. 單元的設計兼顧了單篇內部的研究、各篇外部的聯繫，以及各單元的聯繫(李德維，1988)。
4. 目標定向，符合教育心理學的規律(吳文俊，1991)。教師的教學與學生的學習，都有清晰的方向，可以減少教與學兩方面的隨意性(周漢光，1998)。

語文單元設計方式的多樣化

中文科單元的組織方式，是多姿多采的。不同的單元組織，即可發揮不同的教學效能。

張志公和張定遠(1981)列舉了七種單元教學的組織方式，每一種均有不同的作用及教學效果：

1. 體裁相同或相近的幾篇課文組成單元。
2. 課文加知識短文組成單元。
3. 知識為主、文章為輔組成單元。
4. 用比較方法組織單元。
5. 語文知識為主組成單元。
6. 按作家的作品組織單元。
7. 按年代組織單元。

柴良喜和唐菊英在〈對「一次多篇法」的探索〉一文中提出三種組合單元的方式：

1. 題目相同的教材組織在一起。
2. 表現手法相同的教材組織在一起。
3. 風格相同、思想相同的教材組織在一起。

可見柴、唐二人的組織方法著眼於教材「相同」的部分(引自周南山，1989)。

上述諸人的主張，提出了組織單元的不同方式，可以說是多采多姿的。

比較進一步討論不同的單元組織而有不同的教學功能，則有下列的主張：

包為業(1989)著眼於「同中有異」的特點，將課文組合，進行比較，從而發揮不同的教學功能：

1. 類似題材、不同體裁的課文 —— 有助增加文體感，了解寫作目的和文體的關係。
2. 不同題材、同一體裁的課文 —— 加深認識該種體裁。
3. 同一體裁、不同類型和寫作的課文 —— 有助綜合認識文章的類型和寫法。
4. 同一體裁、不同風格的課文 —— 可以比較不同作家的風格。
5. 同一題材、同一體裁而不同結構的課文 —— 有助增加對文章結構的綜合認識。

可見語文單元組織的方式的多樣性，會因文章的題材、體裁、類型、寫法、風格、結構的不同，而有不同的組織方式，從而也發揮了不同的教學效能(周漢光，1998)。

語文教學單元發展的路向

1. 探究中文科的學科結構，使主、次目標均能落實

在六十年代，布魯納(Bruner, 1960)等人探討知識在課程中所居的地位，特別強調學科結構。因為通過學科的知識結構，可增加學生駕馭知識體系的能力；而學科結構本身，又隱含了探究學科知識的基礎。這種重視「基本概念」及「治學方法」的學習，至今仍然有其不可磨滅的價值。

對於學科結構方面，西方課程學學者許瓦布(Schwab, 1964)指出所有學科都具有三種結構。這些結構，標示了學科的特色與探究的方法。這三種學科結構是：

1. 組織結構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這種結構界定了一個學科基本上如何有別於其他學科，為該學科理出了頭緒，並幫助說明所獲得的知識如何可為其他學科的知識合併。總之，某科的組織結構，可以顯示該科與其他學科相異和相同之處。

2. 實質結構 (Substantive Structure)

亦稱「概念結構」(Conceptual Structure)，是指該學科的全套觀念。實質結構除了概念之外，還包括解釋概念與概念問題關係的語文敘述。實質結構提示我們：在探究上，應採用的問題的種類、所蒐集的資料、以及在解釋資料所將用到的概念。

3. 語法結構 (Syntactical Structure)

所謂語法 (Syntax)，是「對話的形式」(the form of the discourse)。不同的學科在蒐集資料、詮釋資料、考驗其主張，以及在推廣其發現的結果方面，各有其不同的方式。而用來完成這些任務的方法，即構成了學科的「語法」。

可見掌握學科的結構，是通往學習的平穩而快捷的途徑，同時也是獲得探究方法的重要方法。

中文科的學科結構，主要包括聽話、說話、閱讀、寫作四大能力的要素。這些要素與觀察、記憶、思考、想像等智力因素是密切結合的。其中：

聽話能力 —— 辨音識義能力、記憶整合能力、理解語義能力、評判話語能力；

說話能力 —— 組織內部語言的能力、快速語言編碼的能力、運用語音語體的能力；

閱讀能力 —— 認讀能力、理解能力、評價能力、閱讀技巧的活用能力；

寫作能力 —— 審題、立意、選材、構思、表達、修改等方面的能力。

此外，尚包括人性塑造的要素：情感、意志、習慣、性格等重要因素（閻立欽，1997）。

細察本港現行中學中國語文科的教學目標，有下列兩項：

1. 培養學生閱讀、寫作、聆聽、說話和思維等語文能力，提高學生學習本科的興趣，並使學生有繼續進修本科的自學能力。
2. 藉著本科的教學，啟發學生的思想，培養學生的品德，增進學生對中國文化的認識，並加強學生對社會的責任感（香港課程發展議會，1990）。

這兩項教學目標中，標示著中國語文科幾個重要的學科結構：聽、說、讀、寫等語文能力、思維能力、學習本科的興趣、自學能力、思想品德、中國文化與對社會的責任感。

若我們再追問下去，什麼是中國語文科的「主要」學科要素？我們當不難發現：聽、說、讀、寫四種能力是中國語文科要教授的首要要項。因為在中學各個科目之中，只有中文科才有系統地針對學生學習這些要素。「思維能力」方面，相信中學其他各科都會在它們的「學科結構」中從不同的範疇與方式培養學生的思維能力；在提高學生學習本科興趣方面，中文科老師固然努力以赴，但其他各科的老師，又何嘗不然？「自學能力的培養」，其他各科的老師，也是關心著意的。當然中文科的自學能力，與其他科的自學能力，在本質與方法上也有不同；至於「思想品德」的培養，也是其他各科所關注。所不同的，可能中文科發揮的機會較多，而培養的方法與其他各科也有所不同而已；至於「中國文化」，歷史、地理、社會、公民等科，都會為學生提供不少學習的機會，甚至經濟、宗教、數學、化學、物理等科，也會或多或少帶出與中國文化相關的問題，而非中文科的專利。當然，中文科與中國文化的關係相當密切，而可教性又「俯拾即是」，大有「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形勢，這種「可貴」與「方便」，正是中文科老師所應珍惜而善加利用的。但無論如何，我們要了解，教學生中國文化，並不是中文科所獨有的。至於「加強學生對社會的責任感」，又是每科老師

努力的方向。只有培養學生聽、說、讀、寫的能力，除了早期的家庭教育之外，就落在中文科老師的身上了。

根據本人的觀察：「文選型」教材組織的特點，由於着重篇章的關係，令老師比較注重對學生的思想品質、中國文化與及對社會責任感的培養。因為這些內涵都是從課文內容中探究與演繹出來，教科書的編者、老師的講授，都會極為重視。至於讀寫能力、思維能力與自學能力的培養，一般都相當注重，不過由於以往單篇「文選型」的編排，未能在這些重要的環節有比較全面而有系統的關注，並提出相應的教學策略，實施起來，難免有所不足。今後的單元教材，正宜在這方面多下功夫，相信對提高學生的中文水平必定有所幫助。就聽、說能力的培養而言，中學階段無論在課程與教材方面，都有待開發，則是不容置疑的事實。

2. 考慮學生的智力發展，設計適應校本精神的單元課程

盧梭指出教育的問題不在教學生各種學問，而在於培養學生有愛好學問的興趣（盧梭原著，李平滙譯，1978，頁223）。

洛克認為導師的工作不是要把世上可以知道的東西全都教給學生，而在使得學生愛好知識，尊重知識、用正確的方法去求知，提升自己（洛克原著，傅任敢譯，1985，頁175）。

梁啟超在〈教授法〉一文中指出：教師不是拿所得的結果教人，最重要的是拿怎樣得著結果的方法教人。善教人者，是教人的研究方法（梁啟超，1936）。

呂叔湘也認為教學就是「教學生學」（呂叔湘，1980）。

可見不論中外的教育家，都重視學生的學習因素。

教學課程的安排，也必須基於學生智力發展水平與語文教學的實際，因為這樣才真正能夠達到在語文科領域，全面而充分地提升學生語文能力的目的。

因此在考慮設計中文教學單元時，除了要能揭示教材的最優順序

之外，也必須考慮學生的智力發展因素，根據學生的認知活動的方式，予以組織編排。在編排設計時，必須能夠引起學生對中文學習的興趣、並且能夠教學生學習研究的方法，而非單單是事實、資料的堆砌。

本港的中學派位，目前按學生的成績分為不同組別(Banding)。學生的智能與學習基礎因所屬組別而不同。為了要適應不同組別學生的智力發展與學習基礎，所以近年推行校本課程。為了使中文科的單元課程能更好地適合各校校本的需要，課程的制訂，須從下列方向入手：

1. 改進學習資料；
2. 改進教學策略；
3. 改進學習環境；
4. 發展更好的評估體系，以能包括真正反映學生學習成果的因素。

3. 內容的精選與量的壓縮

在知識激增、信息泛濫的今日，知識內容的擴大是無可避免的。由於學生學習的時間的限制，語文單元的設計，必須是內容精選與量的壓縮。教材的編排，主要在揭示高質素、系統化的教學內容，並依據學生的認知結構予以組織。

若教材只充塞了大堆的「事實」，而絕少提及超越個別具體事象的「概念性架構」，這是不知變通的做法，結果會使學生只靠死記硬背的方式去學習。

精選的內容，使學生學習時目標更為明確，更容易掌握中文科的要素；量的壓縮使學生的學習更加聚焦，減少疲累，樂於去學。

4. 善用課文單元組合的不同形式，以達成教學目標

上文提到中文科單元的組織有不同的方式，而不同的單元組織可以發

揮不同的教學效能。教師可善用這些不同的單元組合形式，以達到中文科不同的教學目標。

結 論

面對單元教學的改革，教師要先了解中文科的結構，才能判別哪種教材是較為重要，以決定教學活動，開展對該學習主題的教學。

單元教學要求教師對中文科的「學科結構」有更深入的认识，在「重點講授」與「總結鞏固」的階段中，要能夠把單元的要素完整地、有系統地介紹給學生；同時要求教師對學生的基礎知識與學習情況有更加深入的了解，以便在「自學探究」與「綜合訓練」的階段，能針對學生的智力與學習基礎，選擇合適的教材與練習，以達成該單元的教學目標。

布魯納 (Bruner, 1960) 認為「學科結構」之學習，具有下列的涵義與功用：

1. 在於探究事物如何彼此發生關聯；
2. 可使該科更易於了解；
3. 可降低遺忘之速度；
4. 可透過組型 (Patterns) 對細節加以重組；
5. 是通往「訓練轉移」(Transfer of Training) 之要道；
6. 可縮小「高深知識」(Advanced Knowledge)，與「基本知識」(Elementary Knowledge) 之間的鴻溝；
7. 可激起知識上的興奮感；
8. 可作為「直覺性思考」(Intuitive Thinking) 之基礎並加以提升；
9. 是通往「簡易化」之橋樑。

布氏上述的分析，正好給我們在設計中文科單元教學時有下列的啟示：

1. 在進行中文科單元設計時，正好透過單元的組型，對單元的要素，進行細節的重組，以便更能達到教學目標；
2. 利用單元的設計，把知、能的「訓練轉移」做得更好；

3. 利用單元的設計，安排適切的活動與要素，使學生更能激起知識上的興奮感；
4. 通過對教材的精選與量的壓縮，使學習更加簡易、聚焦。

參考文獻

- 包為業(1989)。〈淺談中學語文教學中的比較教學〉。《語文函授》，第6期，頁42-44。
- 吳文俊(1991)。〈中學語文單元教學探微〉。《無錫教育學報：社科版》，第3期，頁28-31。
- 呂叔湘(1980)。《葉聖陶語文教育論集·序》。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
- 李德維(1988)。〈建立整體的單元教學觀〉。《中學語文教學》，第2期，頁10-14。
- 周正達(1988)。〈高中語文教材改革的總體構想〉。《課程·教材·教法》，第5期，頁29。
- 周南山(1989)。〈新時期中學語文單元教學研究綜述〉。《語文教學通訊》，第10期，頁42-44。
- 周漢光(1998)。〈讀文教學的單元化構想〉。載《創思蒼萃——學者談中學中國語文課程》(頁9-24)。香港：香港教育署課程發展處。
- 洛克原著，傅任敢譯(1985)。《教育漫話》。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 香港課程發展議會(1990)。《中國語文科中一至中五課程綱要》(頁9)。香港：香港課程發展議會。
- 張志公、張定遠(1981)。〈談談單元教學〉。《語文教學通訊》，第7期，頁4-7。
- 梁啟超(1936)。《飲冰室合集》(頁917)。上海：中華書局。
- 陳元暉主編(1988)。《教育與心理辭典》(頁82)。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 黃政傑(1992)。《課程設計》。台北：東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 歐陽汝穎(1998)。〈中國中學語文科課程組織的革新〉。載《創思蒼萃——學者談中學中國語文課程》(頁25-40)。香港：香港教育署課程發展處。
- 盧梭原著，李平滙譯(1978)。《愛彌兒：論教育》。北京：商務印書館。
- 閻立欽主編(1997)。《語文教育學引論》(頁46-47)。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 Bruner, J. S. (1960). *The process of education* (pp. 7, 23).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Schwab, J. J. (1964). Structure of disciplines: Meanings & significance. In G. W. Ford & L. Pugno (Eds.), *The structure of knowledge and the curriculum* (pp. 6–30). Chicago: Rand McNally.

Ways of Developing the Chinese Language Unit Teaching in Hong Kong Secondary Schools

CHOW Hon-Kwong

Abstract

The Chinese language curriculum of Hong Kong secondary schools will begin to change in 2002. As it will directly influence the Chinese standard of the students, we should be very careful about this issue.

The Hong Kong Education Department has taken an active part in promoting the pilot scheme among some secondary schools in Hong Kong, and this shows how eager it concerns itself with this Chinese curriculum reform.

This paper tries to analyze the direction of text selection in the new curriculum reform by considering the subject structure, intelligence of students, school-based concerns, principles of text selection and the learning targets.